

## 人文大師下午茶·陳弱水教授 「歷史探索與公共人文的腳步」

時間：114年11月21日(五)14:00-16:30

地點：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人文館第一會議室

主辦單位：國科會人社中心、國立臺灣大學

主講人：陳弱水(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講座教授)

致詞人：林瑋嬪(國科會人社中心主任、國立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特聘教授)

主持人：陳登武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教授、人文處歷史學門召集人)

與談人：李長遠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助研究員)

郭珮君(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)

陳亭佑(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文學系助理教授)

黃文儀(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)

黃旨彥(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延攬研究學者)

記錄：王亭方(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)，並由陳弱水講座教授審訂。



圖一：主講人陳弱水講座教授(右四)、致詞人國科會人社中心林瑋嬪主任(左三)、主持人陳登武教授(中)、國科會人社中心方震華副主任(左二)和與談學者合影

本次人文大師下午茶由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陳弱水講座教授主講。陳教授長期深耕唐史與思想史，近年亦關注公共人文議題，並積極參與相關討論。此次演講不僅回顧其個人學思歷程，更透過自身經驗，呈現歷史學者如何在專業研究與公眾之間定位自身角色，並思考學院史學與公共史學之間的可能連結。陳教授從研究興趣的形成談起，說明方法與研究領域變化背後的思考脈絡，進而延伸至對歷史書寫以及公共人文實踐的反思；之後，五位與談人進行提問，展開跨世代對話，形成學術經驗的交流。

## 一、學術啟蒙與研究轉向

陳教授首先分享其學術歷程。他於 1974 年考入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，大學時期便決意投入思想史研究。1975 年，林毓生教授於臺大開授「思想史方法論」課程，時為大一生的陳教授旁聽後深受吸引，與此同時也研讀余英時先生的著作。此時期臺灣學界在林、余二人影響下，思想史蔚為顯學。陳教授亦坦言當時的自己與各時代的青年相似，對許多問題感到困惑，並將哲學與思想視為理解世界的捷徑，有如明代陳獻章（1428-1500）所言「櫛柄入手」。因此在大學部期間，陳教授潛心研讀哲學史、歷史知識論等相關書籍。當時理解思想史的方法主要為「內在理路」取向，認為思想具有自主性，不深入思想本身即無法理解其歷史，陳教授最初亦受此影響。

赴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博士學位期間，陳教授反思「內在理路」的取徑，逐漸轉向「思想的社會史」(social history of thought) 研究取向，深受社會史、年鑑學派及其博班指導教授余英時先生的啟發，重新檢視思想與社會結構之間的關係，並體認到「社會相關性」是了解思想及其作用的重要因素。陳教授嘗試將此一新思考落實於博士論文中。在以唐代柳宗元（773-819）為研究對象的博士論文中，陳教授除了分析柳宗元思想內涵，亦努力考察與其思想有關的一切環境因素。雖然在柳宗元案例中與思想關聯較密切的因素是政治而非社會結構，陳教授仍藉此機緣鑽研中國中古社會史。自此，其研究不再僅止於思想史，轉向兼顧思想與社會結構的互動。

## 二、研究領域的擴張

除了研究取向的轉變外，陳教授治學多年，其研究領域亦不斷擴展。博士論文選擇唐史，實與其問題意識密切相關。最初關注宋代新儒學的興起，原以

宋史為研究領域；然而，陳教授逐漸意識到若欲釐清此思想變動的淵源，必須將時間視野推回中晚唐，從更長時段理解所謂「唐宋變革」。當時「唐宋變革」說已提出逾六十年，然而相較於戰國秦漢、漢晉之際，唐宋之際的實證研究仍相對薄弱，多偏於「唐」與「宋」的靜態比較，對於其間歷史變化的原因與歷程關注不足。基此，陳教授確立以唐代為研究重心，並持續深化相關時期的思想史研究。

1990年代初期唐代墓誌大量出版，促使陳教授在思想史之外拓展唐代社會史的相關研究。最初為了深化對唐代中國的認識而閱讀墓誌，卻注意到墓誌中的家庭與女性，以往因傳世文獻缺乏紀錄而無法研究的課題，因墓誌的問世而得以被討論。陳教授遂跨入唐代社會史研究，尤以女性史與家庭史為重，並提出關於歷史現場中「意義」生成的問題，觀察這些女性如何理解自身處境，並探討這些想法與既有文化體系的關係，進一步觀察女性如何運用文化資源支持自身行動。

陳教授的研究雖從唐宋為中心的思想史研究出發，但在對於近代議題與公共事務的關懷下，亦跳開朝代限制，展開對於「公」、「義」等觀念的長時段研究。這項研究始於對「公德」的探討。陳教授指出，因為中國「公」觀念缺乏領域性，因此有「公德」一詞來告訴人們在「公」空間的行為準則。這個觀念創造自日本明治晚期，屬於近代日本「文明開化」的流脈，很快傳入中國。

### 三、對於研究與書寫的反思

研究經驗與閱歷的豐富，使陳教授對於歷史的「研究」與「書寫」亦有觀察。歷史學乃由歷史研究（historical research）與歷史書寫（historical writing）兩個面向所構成。兩者雖經常交互作用、難以截然區分，但歷史學確實存在此種異質結構。在現代史學實踐中，無論是宏篇專書或技術性論文，都不可能完全排除敘事層面；即使再嚴謹的研究，也無法做到「無字無來歷」。從科學知識的角度而言，這種不可避免的書寫成分，成為歷史學的脆弱之處。海登·懷特（Hayden White）在《史元》（*Metahistory*）中以修辭模式分析十九世紀歐洲史學，正是針對歷史書寫的敘事特質提出反思。

在當代史學發展中，研究與書寫似乎形成某種張力：研究強調實證與方法，書寫則涉及敘事與表達。陳教授亦坦言，自己正在嘗試一種以書寫為主、同時企圖融入研究深度的作品，希望能突破兩者之間的界限。為說明這項理想，他

引用英國史學家休·特雷弗-羅珀 (Hugh Trevor-Roper) 的觀點：歷史學者如何能在敘述時勢流動的同時，又承載那「翻滾的深處」——亦即在每個時點承受事件壓力的社會結構——並且仍使結果清晰可讀？這正是史學最大的挑戰。歷史家既要捕捉事件的流動，又要呈現結構的深層，兩者兼顧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，卻也是值得不斷追求的理想境界。

#### 四、公共人文的腳步

陳教授首先說明對於公共人文的思考。指出此處「公共人文」的人文乃「humanities」，即人文學，與一般用以形容文化素質的「人文」不一樣。公共人文最寬泛的意涵，是指人文學與公眾或公共領域之間的互動。陳教授表示他更傾向以 *publicly engaged humanities* 來理解，即「帶有公眾參與與關懷的」人文學。然而，公共人文並非易於界定的概念，因為人文學本身高度多元，不同學科與公共領域的關係和連接方式皆不相同，且其範圍往往涵蓋部分社會科學。以歷史學者的身分出發，他所談的公共人文自然帶有公共史學的取向，亦承認其片面性。

在陳教授看來，公共人文大致有三個面向。一是公眾服務，最常見的是專業知識的轉譯與普及，但也包括運用專業能力回應公共議題。二是以公眾為對象的人文學。相較於專業學術必須在既有學術架構內主張價值，公共史學以公眾連結為依歸，可以更自由地處理個人史、家族史、社區史或地方史，其核心在於「不要遺忘」，而非追求學術框架內的意義。三是公眾參與或公眾協作的人文學。此類強調知識與社區結合，部分學科如人類學等很強調此面向。至於對歷史學，在大眾歷史的建構上，納入民眾自身的記憶與聲音於今日而言重要性亦日益增加。在提出公共人文基本框架的同時，陳教授提醒我們，公共人文並不能涵蓋公共領域與人文之間的全部關係，因為公共場域本身就長期存在各種歷史與文化元素，其運作亦具有自主性。

最後，陳教授分享其個人實踐經驗。在公共人文中，他主要參與前述第一種面向——以專業知識撰寫公共評論。陳教授自幼關注公共議題，亦偶有參與公共活動，但直到 2019 年香港反送中運動爆發，陳教授才開始較持續地發表評論，試圖向臺灣社會說明香港的處境。隨著情勢變化，關注逐漸轉向臺灣面對的現實威脅，並在近年持續為此發聲。此外，陳教授也曾以其歷史專業處理公共議題，如探討臺北街道命名的歷史淵源，即便並非臺灣史專家，仍透過檔案

與史料分析，澄清事實，為公民社會提供歷史知識的基礎。對陳教授而言，公共史學並非離開專業，而是以學術方法回應公共關懷，在歷史與現實之間建立可被理解的橋梁。

## 五、提問與回應

提問：陳教授提及公共人文服務，即學術知識經由轉譯服務社會大眾。以日本公共電視（如NHK）為例，日本長期穩定投入資源，製作高品質的歷史與人文節目，將學界前沿且複雜的研究成果轉化為大眾易於理解的敘事形式，成功搭建學院與社會之間的橋梁。想請教陳教授，臺灣是否可以參考日本這種學術與公共媒體協作的模式？此種制度化的知識轉譯，與近年興起的「知識型網紅」現象有何不同？

人文學術與公眾之間的關係大致可分為兩個面向。其一是由學術界主動出發，將專業研究成果進行轉譯與普及，轉化為公共資源；其二是由公共領域如公共電視、出版社等主動發起計畫，再向學界汲取專業知識。日本之所以能長期穩定地產出高品質的人文內容，關鍵在於日本已建立成熟的「合作鏈」與文化生態體系，從原創研究、文學作品，到劇本改編與專業歷史指導，各環節彼此銜接，形成強而有力的節點。至於臺灣的現況，陳教授認為，在出版與展覽等面向已有相當基礎，但若要進行大規模且制度化的知識轉譯計畫，仍面臨困難。若欲長遠發展，臺灣需要培養出完整且強韌的文化「生態系」，使合作鏈上不同位置的人才得以穩定協作。此種生態並非短期可以形成，需要長期投入與制度支持。

提問：陳教授的文章〈寫作與寫作教育〉對於寫作相當關注，請教在學生時期到成為專業研究者的過程中，應如何持續鍛鍊並精進寫作能力？

這大致可歸納為四個面向：第一，隨時隨地練習。寫作能力並非一蹴可幾，而是日常積累的成果。第二，重視句式選擇與漢語語法。陳教授指出反覆使用單一結構而顯得單調，他認為應理解漢語本身的特性，熟悉不同句型的運作方式，才能寫出清晰而有層次的文章。第三，理解並經營自己的寫作風格。寫作既有規則，也有個人特色。作者需在長期實踐中體會自身語感與表達習慣，逐漸形成較為穩定的風格。第四，講求「一體成型」的結構。一篇成熟的文章，應在構思之初即具備整體架構，而非拼貼式組裝。

提問：在現代社會中，知識分子面臨邊緣化的問題，人文研究者該如何從專業的學院研究，重新走入公共領域進行實踐與反饋？個人在私領域的價值觀與公共議題上的表述，是否存在一致性或衝突？

知識分子在社會環境中的角色在歷史上本就一直隨時代改變，陳教授建議以「公民」角色出發，再視個人興趣與機緣將專業知識帶入公共參與中。成為公共知識分子應該是自然而然的「結果」，而非刻意立志的目標。至於個人的不同角色身分之間，陳教授認為並不會衝突，單純是「時間分配」的問題。

提問：近年臺灣教育在全球化語境下高度強調國際化，但在實際教學現場中，學生對於島內異質群體（特別是弱勢群體）的理解卻相當有限。歷史或人文教育該如何在學院內培養對「內部他者」的想像與認識？

陳教授認同「學院就是公共領域的一部分」。學者多數時候根本不需要踏出學院，大學裡的通識教育或導論課程等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公共領域。不過關於認識他者，陳教授指出臺灣因為過去長期的「去臺灣化」，導致認識「自我」就有困難，更遑論認識他者。像臺灣原住民其實是「自我當中的他者」，而不僅僅是外在的他者。陳教授建議可以從「認識自我」出發來引導學生，同時必須反思中國傳統文化中較為強烈的「自我中心主義」，例如在歷史文獻中常以華夏觀點去歧視其他族群，這也是我們認識他者時的文化障礙。

提問：在自媒體普及、演算法與大數據造成的「分眾化」與「同溫層」環境下，專業論述該如何突破屏障，在快速消費的資訊環境中維持深度與影響力？年輕學者在公共發言時常牽涉立場問題，甚至擔心影響職涯發展，該如何拿捏？

陳教授坦言演算法與分眾化是目前極大的難題，這導致社會溝通出現障礙，甚至連對「事實」的認知都難以溝通。要突破現狀，依然可以仰賴「紙本出版」，雖然紙本受眾較少，但能提供不那麼碎片化、內容較為豐富且有系統的論述。至於年輕學者公共發言的立場問題，陳教授建議，個別立場發言與長篇論述可分別經營，以維持專業形象與公共表述之間的平衡。